

下崗、職業流動與職業教育課程改革

張學敏 陳恩倫

引言

下崗，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名詞。當“鐵飯碗”開始裂縫的時候，中國人便使用“待業”這個詞來表示在職人員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一社會現象。也許由於“待業”這個詞不能較確切地表達中國的實際情況，比如，到了法定成人年齡後而沒有找到工作的人也叫待業，所以針對在職人員離開了自己崗位的現象，人們又用了“下崗”這個詞來表示。其實，待業也好，下崗也罷，在中國都指的是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失去了原有的工作，與國外“失業”的概念沒有多大區別。只不過中國人幾十年對“失業”這個詞諱莫如深。直到 90 年代以來企業改革日益深化，人們才開始正視：完全消滅失業現象，必然以企業內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為代價。因而，在幾十年的“大鍋飯”和“鐵飯碗”經濟體制改革之後，國有企業的改革終於邁出了讓職工下崗、失業這一步，以求效率的提高和效益的增加。集體企業和一些事業單位也存在同樣的情況，下崗、失業在中國已經不是讓人難以設想的事了。下崗人員也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新的特殊群體。職業教育也因應社會問題而作出調節和革新。

下崗與職業流動

據調查和不完全統計，中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有 2200 多萬以上的富餘職工，已經下崗的職工有 1100 多萬以上。上海、瀋陽、福州、鄭州、成都幾個城市的下崗職工占職工總數比例分別為 14%、23%、27.5%、14.8%、20-30%(李連仲，1998)。有些統計和估算更高，認為全國富裕職工高達 6000 萬人(陳紅愛，1997)。總體分析一下下崗現象，我們發現有以下“六多”的特點。

(一) 中青年下崗職工多。24 歲及以下的占 67.3%，45 歲及以上占 7.7%。從勞動年齡的定義講，有 90%以上的下崗職工為中青年。

(二) 的低文化素質職工下崗多。52%的下崗職工為初中或以下文化程度。

(三) 缺少技術專長職工下崗多。從下崗中國的工種看，絕大部分為普通技工或雜工，約占 90%。

(四) 女性職工下崗多。女性就業僅為總就業人口的 40%，而下崗中女性高達 50%以上。

(五) 第二產業下崗多。在下崗職工中第二產業為最多，高達 70.3%，在第二產業中，工業企業下崗職工占到 91.5%，其中尤以製造業居多。

(六) 有企業職工下崗多。占下崗職工總數的 63.6%(樊保力、程春，1998)。

對於上述特點，筆者認為從教育和職工素質及生產變革方面看至少可以說明兩個問題：

其一，文化低、技術水平低、工作經驗不豐富、適應能力較差者易於被拋棄於現代工業化生產過程之外；這批人多數為“文革”期間的學習下鄉“知識青年”，青少年時期沒有受到良好的文化和技術教育。

其二，多年來國有工業企業技術老化、設備陳舊、管理落後，在市場競爭中缺乏優勢，其破產、減產或突如其來的資產重組、轉產等情況使大量文化低、無技術及適應能力較差的職工易於淘汰和下崗。

再就業與培訓

中國出現的大量下崗現象，雖然是經濟體制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所形成的必然結果，但如此龐大的下崗職工群體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又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壓力。國家對此也作出了許多解決措施，制定了不少鼓勵企事業單位聘用下崗職工的政策，不斷推出形式多樣的“再就業工程”。這些方法在短期內及一定程度上解決現有下崗職工的“吃飯”問題是切實可行的，但是這樣的“再就業工程”只能是應急措施。如何使中國的人口負擔變為人才資源，從根本上保證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需要抓好教育這項最基礎的工程。據國家勞動部門的預測，“九五”期間全國將新成長 7200 萬勞動力，城鎮為 5400 萬左右，同期僅能安排 3800 萬人就業。到“九五”末期，城鎮失業率將達到 7.4%(樊保力、程春，1996)。這個數位在發達國家也令人瞠目，因為宏觀經濟學把 3%定為“失業警戒線”。未來幾年內，農村新增加勞動力總量將達 2.14 億，按土地容納能力和“八五”的轉移速度預測，未來幾年只能消化和轉移剩餘勞動力 7700 萬人，尚有 1.37 億需要轉移(經濟日報，4 月 10 日)。這些資料充分表明，中國在勞動力問題上未來的壓力更大，僅僅依靠資金投入增加企業生產擴大就業容量是不夠的，無論多麼完美的“再就業工程”也不能解決更長遠的、現今無法預測的“下崗”問題。所以，遠而慮之，面對現代化工業生產和現代企業制度的今天和明天，唯有教育的改革，以新型的教育培養未來的中國職工，讓他們較早具備換崗、職業流動所應該具備的文化、科學、技術知識和能力，才是一切“再就業工程”最好的基礎。

職業流動特質

職業，是指具備一定生活素質和技術能力的人們為了謀生和發展而從事相

對穩定、有收入的、專門類別的生活勞動，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原始社會初期並無職業可言，雖然在氏族成員中有自然分工，比如男子外出作戰、狩獵、捕魚，女子在家管理撫養子女、製作食物與衣著等，但還沒有形成專門的職業。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我們的祖先進入了畜牧兼農耕的階段，社會分工開始逐漸形成。《禮記·禮運篇》中記載的“選賢與能”、“男有分，女有歸”就朦朧地反映了氏族首領與一般氏族成員的社會職責，“分”指原始的職業，“歸”指有了可靠的生活。隨後，由於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出現了專門經營交換的商業；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出現，又導致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工和對立。至此，人類社會“出現了從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管理國家以及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詳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樣，人類社會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職業。

職業自產生以後，就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而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主要表現在職業分工由簡單到精細，職業內容不斷棄舊更新，職業結構不斷調整，新型職業不斷產生，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不斷提高。尤其是二戰以後，這些變化在世界各國表現得更為明顯和深刻。反映在個人的職業生活上便是職業流動越來越廣泛和頻繁。

市場經濟及其它因素的衝擊

職業流動，是指由職業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引起的職業轉換，是勞動者放棄原有職業崗位而獲取另一種職業崗位的勞動角色的變換過程。社會學家Heinz(1999)認為，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發展越快，勞動者職業崗位的轉換速度也就越快。世界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足以說明這一點。瑞典職員的年流動率為5%-10%，工人流動率為20%-25%；在美國，大多數人一生中一般有8-10次的職業流動；在匈牙利，1964年至1969年期間，國營企業職工的流動率為41%，1973年，職業流動的人達20%，1986年為23%(家月郎，1993)。在中國的過去幾十年裏，由於計劃經濟體制和勞動人事制度等因素，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以及行政事業單位的職工都基本上從事著較穩定的職業，很少流動。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商品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各種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必須按市場運行的要求重新配置和組合以使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國營企業等都不同程度的出現富餘人員，因而，待業—下崗—再就業的形勢在全國風雲般展開。其實，待業—下崗—再就業的過程也就是職業流動的過程。

現代社會出現如此高頻度的職業流動現象各國都有著相似的必然的社會原因：

其一，科學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各產業部門的職種數以及每一職種數的職位數都越來越少，這就使剩餘出來的勞動者不得不謀求其他職

業，而出現了職業轉換而引起的流動。

其二，隨著生產力發展水平導致新職業不斷產生、舊職業不斷消失。從舊職業崗位上游離出來的勞動者必然流向新職業崗位。

其三，社會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新興產業部門的出現，使舊的產業部門和職業崗位不斷淘汰，而新的產業部門和職業崗位又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資源。

其四，勞動者為追求和實現更高職業特權也促進了職業流動。一般說來，勞動者總希望在報酬高、工作條件好、勞動強度低、福利待遇高的職業領域裏工作，這也在一定程度使職業流動人數增加、頻度增強。

其五，就中國大陸國而言，過去的職業選擇帶有終端性，其流動性很小；現在，市場經濟體制為勞動者的職業選擇和職業流動創造了條件；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合同制”、“聘任制”的實施，也迫使勞動者必須考慮職業流動問題。

最後，由於勞動者的職業選擇不免帶有一定盲目性、不確定性和不完善性，也容易導致日後的職業流動。

上述表明，職業流動已是大勢所趨的事實，在中國，下崗——再就業也是人們經濟生活中的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所以，下崗是我國現階段出現的特殊現象，職業流動才是現代社會發展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固然，政府採取暫時的、應急的“再就業工程”很有必要，但是，從趨勢來看，除了社會綜合改革，更重要的是要進行職業教育改革，職業教育的根本應該是整個教育課程的改革。

職業教育的發展

“文革”以後，中國大陸中等教育結構作出了很大調整，各種職業學校應運而生。但是，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卻存在一個嚴重不足，即是只看重了單一技術教育對生產發展的作用，而沒有看到綜合技術教育在現代生產和未來生產中的特殊功能。這種培養方式的弊端在一些大型企業錄用技術工人方面已經有所表現。中德合資的大眾汽車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員（特別是德方人員）就曾表示，相比較而言，對目前的職高畢業生和經過短期培訓的高中畢業生，他們更願錄用後者。原因是後者的文化素質相對高些，儘管可能後者的操作能力不如前者。但這種差異在上崗後很快就消失了，特別有趣的是往往後者反居其上。他們認為，該公司作為一個開放的現代化大型國際企業，生產技術的轉換頻率相當高，相應地要不斷調整、完善員工的技術結構。就是說，他們更看重員工基本素質高低而不過分要求某一項技術水平(李海豐，1993)。可見，單一職業訓練已經表現出“後天不足”。發達國家也曾出現過這種情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對許多國家的教育與社會發展需要問題作過調查，《學會生存》(1989)指出，那種單一的職業訓練不

適應現代化生產，職業教育應該是“為人們投入工作和實際生活作準備的教育，其目的應該較多地注意到把青年人培養成能夠適應多種多樣的職務，不斷地發展他的能力，使他跟得上不斷改進的生產方法和工作條件，而較少地注意到訓練他專門從事某一項手藝或某一種專業實踐。這種教育應該幫助青年人在謀求職業時有最適度的流動性，便於他從一個職業轉換到另一種職業或從一個職業的一部分轉換到另一部分。”並且建議：“學校必須為學習者掌握各種技術奠定牢固的知識基礎。”

綜合技術教育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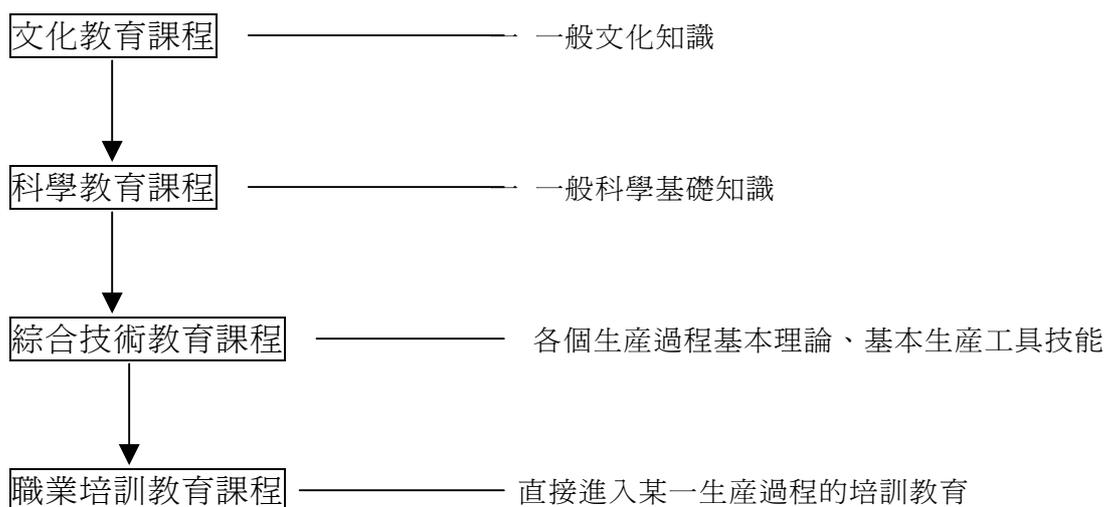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筆者認為，鑒於我國目前大量下崗職工現象，以及職業教育明顯存在的不足，我們必須改革單一的職業培訓，在整個連續的教育過程中開設“綜合技術教育”課程，職業教育課程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

“綜合技術教育”雖是馬克思在 19 世紀考察機器大工業生產時提出的一種教育思想，其基本精神對我們現在仍有指導意義。它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要讓青少年學習“生產各個過程的基本原理”，二是讓他們掌握“運用各種生產的最簡單的的工具的技能”。大工業的發展使生產部門越分越細，然而生產的技術基礎則越來越綜合統一。因而，任何生產過程的“基本原理”都具有共同性。大工業的這一特點不僅需要所有勞動者學習共同的“基本原理”，而且勞動者若能全面瞭解、學習各個生產過程中的共同基本原理，就為他們在各個生產過程中的流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提供了全面流動的可能性。綜合技術教育的第二方面內容是讓青少年獲得運用各種生產的“最簡單的的工具的技能”。在傳統機器體系中，工具機是最基本的生產工具，不管其具體形態如何，它都是各個生產過程體系中不可缺少的最基本部分。所以，在馬克思時代，獲得運用工具機的技能，便是綜合技術教育的第二方面內容。

現代化的職業培訓課程

各個生產過程的“基本原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當前，現代化生產過程已不限於機械論學等運用，而且更增添了生物工程、微電子技術以及控制論指息論系統論等現代科學的運用。“最簡單的的工具的技能”也同樣在不斷變化，當前現代化生產的最簡單的的工具已不是一般的機器。機器人的出現，電子電腦的發明，都使生產工具發生了新的革命。在很多現代化程度高的生產企業，電子電腦已代替了人腦和手直接對機器體系的控制。而且電子電腦已逐漸成為各個生產過程所共同運用的簡單生產工具之一。所以，獲得運用電子電腦的技能，也就成為綜合技術教育的基本內容。

我們可以把現代教育的課程分為這樣幾個相關連續的部分(見圖一)：



圖一：現代教育的課程組合

結語

在全球知識經濟和資訊科技的衝擊下，中國大陸職業教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以上幾種教育課程缺乏任何一個環節都將成為不完整的現代教育。綜合技術教育課程在其中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它將科學知識轉化為基本生產技術知識和技能，然後通過職業培訓使進入生產過程的人員迅速地直接從事生產，並能面臨現代生產所帶來的職能更動和職業流動而不至於束手無策。鑒於這種理解和前述認識，筆者認為，中國職業教育改革的方向不是強化單一職業教育課程訓練，將專業分得過細過窄，而應該在職業培訓之前增加綜合技術教育課程。只有這樣，連續而完整的現代教育才能不致因失去綜合技術教育這一環而影響對未來從業人員的培養，避免由於專業太窄而使未來從業人員適應不了現代經濟社會職業流動的普遍趨勢。也只有這樣的改革，才能使當今教育適應現代經濟發展，主動為經濟發展服務。

參考資料

李連仲(1998)。〈加大力度解決再就業問題〉。《探索》。1998年第2期。

陳紅愛(1997)。〈對目前及九五期間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分析與預測綜覽〉。《社科資訊》，第3期。

樊保力、程春(1998)。〈下崗山重水復，再就業柳暗花明—對吉林省職工下崗

情況的調查與思考》。《人口學刊》，第 2 期。

〈九五’就業壓力空前〉。《中國市場經濟報》，2 月 7 日。

〈九五’就業目標確定〉。《經濟日報》，4 月 10 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卷。中國：北京出版，頁 221。

家月郎(1993)。〈論職業流動〉。《職業教育研究》，第 3 期。

李海豐(1993)。〈也談誤區〉。《職業技術教育》，第 8 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著(1989)。《學會生存》。中國：職業工教育出版社，頁 25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中國：北京出版，頁 218。

Heinz, W. R.(Ed.). (1991). *From education to work: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